

求真致用 砥砺前行

——苑书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访谈录*

董丛林 武吉庆 李敏访谈整理

【编者按】苑书义,1929年生,吉林安图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九十余篇,出版专著或主编著作十余部,其中九部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优秀成果奖。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称号。

一、早年求学经历及太平天国史研究

董丛林:苑老师您好!1945年日本投降时,您在敦化中学念书,不久转到解放区吉林省立延吉第一中学,在那里念到高一。您能否谈一谈在中学的学习情况?解放区教育与日伪时期有什么不同?在这一时代转变中,您印象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苑书义:我出生在1929年9月16日,两岁时日本侵略东北,一直到16岁,当了14年亡国奴。在日伪时期,东北的中学是四年制,没有初中和高中之别,只有“普通”和“职业”之分。普通中学也称国民高等学校,我考的是敦化农业学校,因为上农校可以使经济困难的家里减少些学费负担。敦化农业学校的文化课有数理化和语文、历史。语文课教的不是中文,而是日语;历史课则是只讲满族史和日本史。这个农业学校的文化课占比较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包括春播、夏锄、秋收,我还养过猪。因为当时东北经济困难,有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山里收集橡树籽,回来磨成面吃。我在校时,敦化农业学校改为敦化国民高等学校,变成了普通中学。解放以后,我就从敦化国民高等学校转学到延吉市(当时解放区吉林省的首府)吉林省立延吉第一中学(下文简称“延吉一中”)。这个学校的学制跟日伪时期不一样,它分初中和高中,教学内容也有很大不同,数理化主要是教数学;语文是咱们的汉语;还有历史课,主要讲中共党史。

我最大的体会是,伪满时期的中学企图把我们培养成任日伪驱使的奴隶,而解放区的中学是要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内容已经苑书义审定。

把我们培养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所以,在延吉一中充满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气氛。解放以后,我最大的感觉是:解放了!我已经从一个亡国奴变成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未来。

董丛林:您是怎样进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当时大学里都学习哪些内容?您为什么选择历史专业,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苑书义:1947年,由于家庭贫困,我从延吉一中辍学,回到临近家乡的凤宁乡,当了四个月的小学教员。因为我在延吉一中上过学,延吉县教育局就把我调到东北大学去学习,学习了八个月。当时学校在佳木斯,吉林解放后,学校就从佳木斯搬到吉林,准备长春解放以后再搬迁到长春市。到了吉林后,我就被分配到辽南工作。我们一行七人到了当时已是解放区的辽南。我先在瓦房店当了一年中学教师,接着调到营口市中学,在那儿做政治工作兼教政治课。1950年,我觉得自己才疏学浅,不能很好地胜任中学教学工作,就要求到东北师大(1950年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进一步深造。

之所以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因为当了14年亡国奴,在那时候我就想,我们的祖国为什么这样积贫积弱,要受别人欺负;第二,解放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把我们的祖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富强、受人尊重的国家。我想追根溯源,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于是,我逐渐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到东北师大就进入了历史系。历史系的课程跟现在基本相同,主要是中国史、世界史,还有古文献和政治课。解放初期,非常重视苏联的历史和经验,所以,在东北师大的政治课主要是讲联共(布)党史。在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因为联共(布)党史有专门一章是讲唯物论和辩证法。

董丛林: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您为什么选择中国近代史专业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您以前提到研究生的导师是孙守任老师,受他影响,那时就梦想成为大学者、著名教授。孙守任老师的人生与学术经历对您在学习上有何影响?

苑书义:我之所以选择中国近代史作为主攻方向,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在本科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看到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与抗争、黑暗与光明相互交织的历史,这和中国古代的历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就产生了学习近代史的兴趣。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进入研究生班后,学习的是中国近代史专业。当时的研究生班是东北师大第一次办研究生班,当时成仿吾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东北师大当校长,他鉴于学校的发展情况,决定在各系建立研究生班,主要目的是为本校培养教师。这些研究生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研究生必须经过考试,专业是自己选择的,但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完全是领导选定的。我们历史系的第一届研究生主要是从四年级选调的,三年级只选调了我一个人。专业也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领导分配的。领导分配我研究中国近代史,这正符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特别高兴,就把近代史作为我的研究专业,终身不渝。

孙守任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他是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的得意门生,是研究清史的,解放以后他就改教近代史,近代史大部分是晚清史,加上民国初年的历史。他留给我的印象,一是对自己专业的研究非常刻苦,我经常看到他废寝忘食地研究近代史;二是他对我们特别认真负责,每次给我们讲专题课都准备一大叠讲稿,精心讲解、有问必答、耐心以对;留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最深刻的,他特别注意学习《毛泽东选集》,在读《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往往把心得写在纸上。当时全国正在讨论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线索问题,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线索应该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主。这是他反复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根据《矛盾论》的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他的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也引起了一些争论,这并不奇怪。他这样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了以后还能写出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我很敬佩、很羡慕。这对我影响很大,从此我就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我这一生两次通读《毛泽东选集》,对其他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反复读过。我的理论基础是学习《毛泽东选集》打下来的。

董丛林:1954年研究生毕业后,您被分配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后来随中文、历史系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在北京一直工作到1969年。当时历史系的师资盛况空前,有张恒寿、王树民、黄德禄、胡如雷等诸多名师任教。那段时期,您还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任职过。这个时期的经历,对您的学术成长有什么影响?

苑书义:当时北京市历史学会设有几个组,其中有一个中国近代史组,戴逸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李文海是秘书。因为任近代史组副组长的缘故,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北京市的专家学者。另外有幸参加了一次年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被收入年会论文集。你提到张恒寿、王树民、胡如雷,他们并不是在北京进入历史系,而是在天津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53年,东北师大组织1953届的历史系毕业生到北京参观,我们研究生班全体都参加了。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在东北见到的最大城市是长春。第一次到北京,游览了故宫、景山、颐和园,从此就爱上了北京。1958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中文、历史专业搬到北京,我非常高兴。在北京11年,最大的收获是两点:第一,开阔了眼界,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壮丽辉煌、日新月异,这就使我更加热爱北京,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第二,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学者云集、文物丰富、资料充足,这就给我向专家们学习、广泛收集资料提供了方便。这两个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我的历史研究工作。

董丛林: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哪些?您为什么选择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太平天国人物作为研究方向?怎样评价李秀成的晚节?是否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

苑书义: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就是太平天国研究。如果你统计一下这一时期全国发表的史学论文,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太平天国史几乎占了一半。我为什么选择太平天国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我们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解放前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解决农民的问题,而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研究太平天国可以很好地了解农民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对当时解决农民问题有借鉴作用,所以太平天国史是显学。至于是否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说实在话,我当时还很年轻,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和人物的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可以说我选择研究太平天国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平天国研究是当时的热点,热点就是难点,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迎头而上,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至于应该怎样评价李秀成的晚节呢?我的看法是,研究李秀成必须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有四个事实不容忽视:其一,李秀成的问题是在太平天国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二,李秀成的自述确实有乞降之意,因为他贬损自己、吹捧曾国藩,并且提出招齐章程,想为曾国藩招齐他的部众。其三,李秀成乞降,但曾国藩并没有接受他的乞降,也没有派他去招降太平天国的部众。也就是说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并没有成为曾国藩的鹰犬残害太平天国的余部。其

四,李秀成在临刑前写了绝命词十条,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有记载,并且得出结论:这个绝命词是“叙其尽忠之意”。所谓“叙其尽忠之意”,绝不是为了清朝,而是以死尽忠太平天国,这说明他在临刑之前有所悔悟。评价李秀成的晚节问题必须依据这四个事实,乞降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此之前的农民领袖地位,因为他对太平天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历史学者一致承认的。

董丛林:您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中国近代史新编》,请问这套书是如何编写的?

苑书义: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如何选用教材成为难题。当时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推荐我牵头组织华北六大院校的部分近代史教师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材,经学校领导批准,我到了北京组织写作班子。我的朋友、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得知我在北京组织班子专门编写教材,就向社领导提议把我们编的教材列入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这个建议得到社领导的批准,所以,他就参加了我们的编写工作。到1976年9月,这部两卷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完成,后来内部发行,供华北六大院校使用。1978年,人民出版社邀请我主持编写一套《中国近代史新编》,经过学校领导同意,我前往北京改组写作班子,共有七省市的12位学者参加。

撰写一部近代史新编,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通过对外访贤问学和内部的深入讨论,我们认识到要编写一部新的教材(新的专著),必须彻底清除极左思潮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极左思潮对于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强调阶级观点,忽视历史主义;二是强调政治路线斗争,忽视社会经济发展;三是依据政治路线斗争的需要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四是拔高了农民阶级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五是漠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六是评法批儒,全盘否定儒家学说。接着又进一步明确,要编写一部新的历史专著,必须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因为唯物史观把古老的史学变成了一门科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就必须坚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泛地收集、鉴别资料。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和唯物辩证的方法,对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全面综合性的研究,探索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

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搞清楚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二是要揭示中外反动派的历史罪行;三是要着重阐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四是要以历史作用为准绳,来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五是要注意探索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六是要正确评价法家和儒家。在明确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就决定依据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三个阶段,把全书划分为三卷。我的任务是两项:一是撰写第一卷的太平天国史、第二卷的中国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太平天国史是在我专题研究发表的十余篇论文基础上写成的,20余万字,是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集大成之作;二是负责全书的统编、修改和最后的定稿工作。

我们这部书1981年上册出版,中册、下册分别于1986年、1988年正式出版发行,全书140余万字。到2007年又出版了修订版,我为修订版写了长篇序言。这篇序言有3万多字,概要地叙述了我在史学研究工作中的新进展和取得的新成果。《中国近代史新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当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一部规模较大、内容比较丰富的近代史专著。

二、晚清人物与中国近代化研究

董丛林:20世纪80年代,您的研究重心是李鸿章,您撰写的《李鸿章传》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李鸿章生平的学术著作,具有开创性,后来多次再版,堪称传世之作。当时,您对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有什么新的认识?您是如何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研究的?

苑书义:把这本书说成是“传世之作”过奖了,实不敢当。我研究李鸿章开始是为了研究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所以我第一篇文章是写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后来鉴于国内缺少一部研究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学术专著,人民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李鸿章传》,从此我就从太平天国研究转向了李鸿章研究。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李鸿章是一位非常复杂而又众说纷纭的人物。他是晚清重臣,在晚清政坛活动了半个世纪,他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晚清政局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所以,研究李鸿章既可以了解他的生平事迹、精神面貌和历史作用,又可以通过对李鸿章的研究透视晚清政局的变动和社会的发展,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有好处。研究李鸿章、为李鸿章立传,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写出一个真实的李鸿章,用其善示后、用其恶诫世。为此,我决定遵循列宁的方法,防止情绪支配自己,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主要采取如下做法。一是把李鸿章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李鸿章在政坛活动的时期正处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中国外部有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列强,是中国数千年未遇的强敌;内部有衰微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这个衰微腐朽的王朝正在受到列强的侵略、国内资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冲击。这时候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国家从独立逐渐向半殖民地沉沦,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就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二是广泛收集资料、鉴别资料,把被淹没的史实挖掘出来,把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依据真实史料反映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三是运用阶级分析和唯物辩证的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综合研究李鸿章一生的全部活动,探索李鸿章的形和神。所谓形,就是生平事迹;所谓神,就是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以此探索李鸿章的阶级属性与清朝统治集团、社会变动的关系。四是以历史作用为准绳来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功过和历史定位。所谓历史作用,指李鸿章的一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对李鸿章的研究是从横断面开始的,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在横断面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纵向研究,最后写成《李鸿章传》。

写《李鸿章传》初稿用了八年时间,艰苦备尝。该书1991年出版共31万字,2004年第二版增加9万字,2016年第三版增加4.5万字,最后总计44.5万字,多次印行,印数将近5万册。经过对李鸿章的长期研究,我对他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定位得出了初步结论。第一,李鸿章是中国社会过渡时期涌现出来的过渡性人物。第二,李鸿章一生干了三件大事:镇压太平天国,他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用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这是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情戊戌变法、主张“修明前圣制度”、改革科举制度等,这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化。总的来说,李鸿章是一位言行兼有反动和进步,而以反动为主的封建官僚,是衰弱腐朽的清王朝的忠臣。

董丛林:您对洋务运动还有许多研究,您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问题?

苑书义:列宁有一个论断,我觉得非常正确。他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研究近代历史上的改良和革命,就必须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改良和革命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孕育产生出来的;改良和革命反过来又对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我的结论。

拿戊戌变法来说,戊戌变法是近代历史上典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要研究戊戌变法,就必须放在它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它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是什么呢?当时中国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是衰微腐败的清王朝,而这个清王朝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但力量微弱,而农民运动正处于低潮,就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是什么呢?它主张在政治上,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于保存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先进的,是有助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那么,如果把戊戌变法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放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条件下,情况就大相径庭了。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成长为资产阶级内部的主流派。它提出推翻清朝政府,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最先进、最进步的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提出最先进、最革命的纲领,而且决定把这个纲领加以落实,所以它又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在国内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孕育着、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逐渐形成。如果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再坚持资产阶级改良,那么,这种改良就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有的人否定辛亥革命、肯定清末预备立宪,认为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进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依赖清末预备立宪就可以把中国和平地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吗?我觉得这种论断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一,革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外争独立、内争民主、实现近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二,清末确实开始了预备立宪活动,并得到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支持,两者结合了起来。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想通过立宪消灭革命、抵制革命运动。但也有不同,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立宪派的目的是想通过预备立宪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皇族内阁的出现,就彻底揭穿了清政府搞预备立宪的真实用意,标志着预备立宪的破产。皇族内阁的出现,也惊醒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使它看清了清政府搞预备立宪的真实用意,所以,就逐渐离开清政府,有的甚至转向革命。那么,依靠这样中途已经失败的预备立宪,怎么可能把中国和平地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结局也证明,20世纪革命是主流、是正确的,改良是支流,不可能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董丛林:您的多部论著都涉及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等近代人物,您认为对近代人物评价应坚持什么标准?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节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苑书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在近代史上是著名的人物。李鸿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和首脑,张之洞是洋务派的殿军,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与时俱进的,他们的言行斑驳陆离,犹如一座层峦叠嶂的高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此类人物,评价他们的是非功过和历史定位,我认为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以公平之心、远大的眼光,防止主观情绪支配自己。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依据精准的史料进行研究。应该坚持用阶级分析和唯物辩证的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他们一生的全部活动以及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考察他们的活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不要溢美,也不要贬损。溢美违背历史真实,贬损不能推进科学,应该“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①实事求是,才能够真实地反映这三位历史人物的全部真貌。

董丛林:您在1987年《中国近代史论稿·自序》中说:“马克思主义哺育着我成长,我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历史实际结合起来。”真诚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而选进这部书的文章就是实践这种愿望的尝试之作。这本书有什么特点?这些文字如何体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

苑书义:《中国近代史论稿》是我的一本论文集,一共收集了26篇文章。这26篇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其中有六篇是我在1954年到1966年的13年间写成的,有20篇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10年间写成的,反映了我研究工作的时代烙印。第二,这部论文选集有11篇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有七篇是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八篇牵涉其他方面,鲜明地反映了我研究重点的转换。第三,这部论文集只有一篇是宏观论述,其他的都是微观探索,这表明我的理论水平不高。

但是,这些文章都是我力图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我坚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做法分几个方面:第一,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第二,广泛地收集资料,用精准的史料进行研究;第三,运用阶级分析和唯物辩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写作;第四,以历史作用作为准则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地位。

董丛林:20世纪90年代,您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近代化问题,主要讨论了近代化的主角与内涵、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与英法等国近代化历程的比较、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等问题,主编了一部《中国近代化大辞典》,撰写出版了《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两部著作,形成了系统的认识。您当初是如何构思研究体系的?提出了哪些创新观点?在这些著作中,具体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

苑书义: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主题之一,研究近代化是中外学者一段时期以来的一个热点。我研究中国近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能力构筑什么研究体系,这不是客气话,确实是没能力建构研究体系。我从1990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化,前八年着力于宏观方面的探索。从1999年开始,从宏观探索转向微观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力求有所创新,虽然创新不多,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所发表的这些论文的选题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当中,都是由我首先提出并进行研究的。比如,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研究、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命运、农民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开放主义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设计的农业近代化方案、张謇的开放主义,等等,这算不算

^① 张謇:《追悼孙中山演说》,《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2页。

创新,我也不知道。

至于两本专著也是如此,是我们在近代史学界首先提出,并得到国家资助。《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和董丛林合作写成的,主要研究农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变迁的问题。《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是我和董丛林、任恒俊三人合作完成的,研究的重点是华北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艰难历程。在研究近代化问题过程中,我力图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坚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但是说起来很惭愧,做得很不好,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

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心得

武吉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如何评价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苑书义: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是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提出来的,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胡绳的意见是,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中国近代出现了三次革命高潮。我记得我的导师孙守任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他主张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线索,其他人还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它开启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新的局面。

至于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我认为都是必要的,但两者各有缺点,各有偏颇。革命史范式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强调两个过程——帝国主义、中国封建势力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涌现出三次革命高潮的过程,这就是革命史范式的基本主张。现代化范式主张以为中国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为线索,把近代历史分成四个阶梯。这两种范式有共性,都肯定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也有不同,革命史范式肯定义和团、否定洋务运动,现代化范式是肯定洋务运动、否定义和团。我认为这里关系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义和团和洋务运动;二是如何评价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与近代化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但它最大的缺陷是笼统排外。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须和戎,就是主张对外保持和局,不要战争,因为考虑到中外力量悬殊,战则必败。那么,如何保持这个和局呢?他们主张采取羁縻政策,比如道德说教、以夷制夷,最主要的是出让部分权益收买外人之心,不让他们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政策具有抗争性和妥协性。内须变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即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具有两重性:一是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有利于推进中国军事、经济和科技从传统向近代转化;二是洋务派想利用这些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冑维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从这方面来说是反动的。所以,洋务运动是一次对外具有抗争和妥协、对内具有进步和反动相互交织的运动,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

关于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我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不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国近代化对立起来,两者是紧密联系,互相为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中国近代化开辟道路,而近代化又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社会经

济基础。

董丛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哪些积极意义?是否存在局限之处?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苑书义: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大好处,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学变成了一门科学。唯物史观为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活学活用,只有这样才能挥洒自如,推进历史研究。

说心里话,我自己实在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只是一位力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我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运用还不够活,成果创新不够多,这也是令我十分遗憾的事。

董丛林:您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太平天国史,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学术热点。进入90年代则转向中国近代化研究,这与讲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似有直接关系。您是如何看待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选题与学术热点、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苑书义: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太平天国,确实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农民。毛泽东曾讲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下的天下,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研究太平天国就具有很大意义。因为太平天国把单纯的农民战争推向高峰,研究太平天国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民的阶级性格、历史地位,可以为当时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一些历史借鉴。研究近代化也跟现实有着密切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近代化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早期现代化,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经过许许多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这门古老的学科正在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怎样开拓进取,使之赶上时代的步伐,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我认为正确地处理史学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关键环节。因为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只有为社会发展所需要,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必将停滞甚至消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处理史学和现实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有着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曾经提出“古为今用”的口号,作为解决史学和现实关系的指导方针。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些人把“古为今用”解释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种提法不仅排除了为无产阶级经济和文化服务的内容,而且往往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古今类比、篡改历史。十年动乱把这种错误推向极端,大搞古今类比、影射史学,甚至不惜篡改历史为现实服务。有的人甚至公开说,历史上的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这种种做法就把史学引向了绝路。改革开放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极左思潮影响,挽救了史学。由于正确的理解和贯彻了“古为今用”的方针,就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研究工作。

我认为史学研究应该从两方面着力:一是整理古籍、收集鉴别史料,再现历史真实面貌;二是着力研究有助于解决现实国计民生问题的历史课题。这就需要站在现在的高度回溯过去,从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节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比如,近代化问题就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但是,这种研究不应该重蹈覆辙,搞古今类比,搞影射史学,而是应该坚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历史借鉴。这里首先要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依靠科学性充分地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样就把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了。如果我们学者能够写出把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的著作,就一定会对领导制定政策有实际的参考作用,对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有实际的帮助。因此,史学就会赢得社会上广大群众的欢迎,为史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董丛林:您是如何协调教学和科研关系的?

范书义:在大学里,教学和科研是缺一不可的。对我来说,教学、科研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互相为用的关系。作为教师,中心任务是教学,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如果教学没有自己的科研做基础,只能依据教材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很难提高教学质量。我的做法是把教学、科研结合起来,以教学引领科研,以科研支撑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了历史难题,就把这些难题作为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出来后,可以撰写论文在报刊发表,同时把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当然,我的研究课题并不都是从教学中来的,但是我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可以充实到教学中去。这样就使教学不断充实、不断更新、与时俱进,使学生能够学习到近代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受到学生的欢迎。这样就实现了教学科研双丰收。

董丛林:您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有什么经验和心得?

范书义:我培养了几届硕士研究生,培养了三届博士研究生。我培养研究生,特别着力培养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我认为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决定着他们今后在历史研究中的前景。那么,如何培养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呢?我的做法是,研究生的第一学期集中学习理论,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如果需要,就可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提供的线索去进一步阅读原著。

具体的办法是自学和讨论相结合,一两周有一个重点,先是自己学习,然后同届的研究生坐在一起,由我主持进行讨论。到第一学期末,就开始把学习理论和毕业论文选题结合起来,一边学习理论,一边用学习的理论来研究毕业论文的选题。首先自己学习和研究,提出自己的初步意见。然后同届的研究生坐下来,由我主持大家讨论,对各自的论文选题互相交换意见,集思广益。我觉得这样做对研究生的发展很有好处。

董丛林:现在不少年轻人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学习,您认为当今年轻的一代史学工作者,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问题?有何建议?

范书义:这个问题非常大,非常重要。我现在只能讲讲我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会和做法,不知道对不对。

第一,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它把古老的史学变成了一门科学,是我们打开历史科学殿堂大门的金钥匙。第二,要有计划、有重点地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的《卡尔·马克思》《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通过对这些经典著作的学习,认真思考,就可以初步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第三,带着问题去学。在历史研究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就带着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地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部著作和某篇文章,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第四,把学习和运用结合起来。学习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这样就把学习和运用结合起来了。在学习中运用、在运用中学习,活学活用,循环往复不断升华,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

李敏:回望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您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品质?能否为青年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经验?

苑书义:我考察研究了一些史学家成名的经历,认识到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工作者,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要为人民研究历史;第二,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第三,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才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开拓创新。只要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就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优异的成就。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我衷心希望有志于历史研究工作的青年朋友,能够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成为我们中国史学界后起的耀眼明星。为此,我有几点建议:一要紧跟时代步伐,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新时代的优秀人才。二要下苦功夫,要像范文澜倡导的那样,“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百折不挠、厚积薄发。最后一个建议,希望青年朋友善于独立思考,自由挥洒,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攀登科学高峰,力争使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步地接近、最后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理想境界。这两句诗是元朝元好问对陶渊明诗文的高度评价,我特意把这两句诗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作为参考。

(现场访谈主要提问者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访谈联系、录音整理稿最终审定者武吉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访谈方案设计、录音文字整理者李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050024)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敖凯)